

中国共产党

收缩与调适

Few issues
all the nat
than the r
governme
Shambaugh
weaknesse
potential
(CCP). He
in a protr
undertake
aimed at r
rule. Shan
unique se
interviews
Party is re
grip on po

's
n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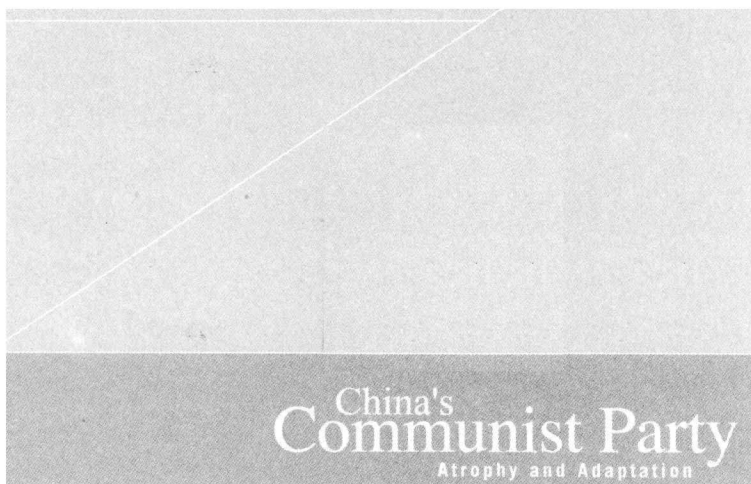
〔美〕沈大伟 (David L. Shambaugh) 著
吕增奎 王新颖 译
俞可平 审定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中国共产党

收缩与调适



〔美〕沈大伟 (David L. Shambaugh) 著
吕增奎 王新颖 译
俞可平 审定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y David L. Shambaugh

© 2008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美)沈大伟著;吕增奎,王新颖译;俞可平审定.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117-1060-4

I. ①中…

II. ①沈… ②吕… ③王… ④俞…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

IV. ①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7451 号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贾宇琰 李小燕 侯天保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5(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195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致 谢

本书源于我对各种共产主义政治体制演变过程的长期兴趣。尽管这些列宁主义（新列宁主义）政治体制各自在本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中演变，但是它们包含许多共同之处。长期以来，我一直确信，要想充分地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演进，就必须认识和理解各种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运转方式、它们经历过的阶段、它们的官僚制度和它们的执政工具，这一切使它们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政治体制。

我在大学时代开始对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产生兴趣。最初，新墨西哥大学一位激情似火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埃伦伯格（John Ehrenberg）教授点燃了我对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兴趣，随后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良好的学术环境最终促成了我的这种兴趣。在那里，我完成了我的本科学业。中苏研究所致力于共产主义制度（世界上少之又少的制度）的比较分析和个案分析。正是这里的一群教授培养和促成了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兴趣，他们是：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liott）、安德鲁·吉奥尔吉（Andrew Gyorgy）、哈罗德·辛顿（Harold Hinton）、威廉·约翰逊（William Johnson）、卡尔·林登（Carl Linden）、弗朗兹·迈克尔（Franz Michael）、弗拉基

米尔·彼得罗夫 (Vladimir Petrov)、盖斯敦·席格尔 (Gaston Sigur)、理查德·桑顿 (Richard Thornton) 等。辛顿教授、迈克尔教授和约翰逊教授还促成我致力于中国研究，同时席格尔教授、辛顿教授和迈克尔教授引发了我对亚洲国际政治的研究兴趣。他们每月举行的中苏研讨会使我有幸聆听了共产主义比较研究领域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宝贵教诲：瑟韦林·比亚勒 (Seweryn Bialer)、于尔根·多姆斯 (Jurgen Domes)、杰瑞·霍克 (Jerry Hough)、查默斯·约翰逊 (Chalmers Johnson)、理查德·洛文塔尔 (Richard Lowenthal)、理查德·沃尔克 (Richard Walker) 等。

随后，我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乔治·利斯卡 (George Liska)、罗伯特·李赛特 (Robert Lystad)、布鲁斯·帕罗特 (Bruce Parrott)、加雷思·波特 (Gareth Porter) 和詹姆斯·里尔登-安德森 (James Reardon - Anderson) 主持了各类研讨班，指导了关于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独立的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为我提供了更多的个案研究和分析视角。例如，正是在尼采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我开始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的利益集团和各种职业群体 (例如科学家)。

接着，我进入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再一次受益于一群从事共产主义制度比较研究的博学的教授们。阿尔弗雷德·G. 迈耶尔 (Alfred G. Meyer) 是共产主义制度研究领域真正资深的前辈之一，他在第一学期主持了激动人心的专题研讨班，后来指导我进行了一项独立的研究，担任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迈耶尔教授是少数几位在解答学生的问题时毫不吝惜时间的教授之一，他耐心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时使我产生了研究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比较研究相关领域的欲望，去探求这些领域之间的联系。两位社会学家阿尔·斯姆克斯 (Al Simkus) 和马丁·金·怀

特 (Martin King Whyte, 中文名怀默霆) 主持了令人激动的社会主义社会比较研究研讨班。罗伯特·德恩伯格 (Robert Dernberger) 主讲了一门指令性经济比较课程。苏联政治和外交政策研究专家威廉·齐默曼 (William Zimmerman) 主讲了共产主义外交政策比较课程, 指导我进行了一项关于共产主义领导层变化的独立研究。齐默曼教授的经典著作《苏联人的国际关系观念: 1956—1967 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9 年出版) 使我深受启发, 促使我把博士论文选题定为中国的美国观察家的美国观。泽维·吉特曼 (Zvi Gitelman) 为我打开了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研究的眼界。罗恩·英格尔哈特 (Ron Inglehart) 是世界知名的政治精英研究专家, 他解释了共产主义制度和非共产主义制度中精英循环的理论和模式。拉里·摩尔 (Larry Mohr) 为我研究组织理论和官僚政治理论提供了帮助, 我的导师——已故的迈克尔·奥克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 教授——鼓励我运用这些理论研究共产主义制度和威权主义制度。在进入密歇根大学的第一天, 我正在制定课程学习计划, 正是迈克尔明确地告诉我: “如果你想理解中国, 你就必须理解官僚政治。如果你想理解共产主义制度, 你就必须理解官僚政治。” 我一头扎进各类等级组织理论之中。最后, 在密歇根大学, 我再也找不到比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和艾伦·怀汀 (Allen Whiting) 更博学的中国研究专家了。这三位教授同样对共产主义制度比较研究感兴趣, 把共产主义比较研究的视角带入到他们的中国研究教学中, 他们都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对于这些以前的教授们, 我一直感谢他们在我的学术发展道路上提供的帮助, 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老师和导师了。

1989—1991 年, 苏东共产主义的政党—国家纷纷垮台, 共产主

义比较研究领域一夜之间也随之不复存在。尽管如此，但我相信，在那之前的理论和经验发现为我们继续分析剩下的四个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中国、古巴、朝鲜和越南——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洞见。我相信，通过这一棱镜研究和理解中国政治体制的继续演进，是中国研究专家们的明智之举。

与许多专门研究亚洲政治、中国政治、俄罗斯政治和中欧政治的同行之间的讨论和交流使我受益匪浅，他们的著作也是如此。我想要感谢这些对我的思考具有特殊影响的同行：鲍瑞嘉（Richard Baum）、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柏思德（Kjeld Erik Brødsgaard）、兹格涅比·布热津斯基、李成（Li Cheng）、布鲁斯·迪克逊（Bruce Dickson）、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爱丽丝·米勒（Alice Lyman Miller）、黎安友（Andrew Nathan）、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谢淑丽（Susan Shirk）和魏昂德（Andrew Walder）。他们每一位都对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也很荣幸有机会与他们进行多年的交流和学习。柏思德教授、迪克逊教授、罗兹曼教授和魏昂德教授还非常热情地阅读了本书的手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本书能够得以付梓，我还要感谢中国、香港和美国的各类学术机构、书店和图书馆。在中国，我特别感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前身是苏联和东欧研究所）。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其无与伦比的馆藏资源，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并在我的几次学术访问中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近代中国研究班使本书一些章节的初稿能够得到充分的检验。不过，我特别感谢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2002—2003年我有幸在那里担任客座研究员，度过了一年的学术休假。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提供

了良好的学术思想氛围，我在那里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开始了本书的撰写。

尽管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为我撰写本书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但在那里的一年时间不足以完成本书。在结束一年的客座研究之后，我回到乔治·华盛顿大学从事全职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这不可避免地减慢了本书的写作进度。幸运的是，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Smith Richardson）提供了另一项研究基金，使我在2005—2006年暂时摆脱教学工作，获得了一年的学术休假，得以完成本书。我非常感谢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及其国际安全项目高级主管艾伦·宋（Alan Song），也非常感谢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的理事会和项目评审专家，他们不仅慷慨地为本书提供了研究资助，而且为我思考和确定本书的研究范围提供了帮助。

除了感谢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外，我还非常感谢乔治·华盛顿大学“学术卓越计划”和席格尔蒙亚洲研究中心所提供的其他研究和旅行资助。没有这些支持，本书绝不可能完成。

倘若没有乔治·华盛顿大学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一些研究助理的帮助，我也不可能完成本书的研究：两年来，罗萨莉亚·陈（Rosalie Chen）一直担任我的全职研究助理，成为我将来评判研究助理的模范；韩恩泽、王亮、劳拉·帕尔（Laura Paler）、孙亮、曾怡娉和李源全都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我的研究助理，我从内心感谢他们付出的劳动和提供的宝贵帮助。

最后，我特别感谢我的家人。这包括我们家忠实的金色猎犬桑迪，在本书写作的全过程中它始终忠实地陪在我的身边。我还感谢我的妻子英格丽25年来的付出以及两个可爱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和亚历山大。克里斯托弗和亚历山大常常对父亲正在写作的东西表现出

兴趣，我只希望我能够更令人信服地向他们说明本书的内容。或许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能够自己阅读本书，更好地理解我们向他们讲述的东西。

华盛顿特区

2007年7月

目 录 Contents

致 谢	1
-----------	---

第一章 导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反省期——探寻长期执政的经验教训	2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的双重状态	4
本书的结构	11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党—国家：西方的论述	13
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演变	18
垮台的原因	21

第三章 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西方的论述	35
悲观主义者	38
乐观主义者	49
中间立场？	58

第四章 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中国的论述	62
风暴之后：1989 年的中国共产党	64
对东欧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崩溃的解释	67

布尔什维克主义诞生地的崩溃	79
更多的事后分析	88
所吸取的经验教训	110
幸存的共产主义政权：朝鲜、越南和古巴	119
到处撒网	125
 第五章 非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中国的论述	126
“颜色革命”	127
非共产主义政党—国家	133
兼收并蓄	147
 第六章 重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之维	149
重塑意识形态	151
宣传部门：收缩中的调适	153
新意识形态	160
从理论到实践	181
 第七章 重建中国共产党：组织之维	183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183
加强党的建设	187
领导集体的更替	215
 第八章 继续执政：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存在吗？	225
中国共产党的收缩与调适：资产负债表	225
预测未来	235

第一章 导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如果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和所有与之交往的国家，那么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的性质了。1949 年以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① 本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具有的优势、弱点、持久性和调适性以及长期执政的潜力。本书关注的是作为一种建制（institution）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政治体制（后者必然包括国务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级和省级以下的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他非党组织机构）。这是读者从一开始就应该记住的重要区分，要不然，读者就会奇怪，为什么没有把一系列的因素——少数民族、经济、台湾问题和国际关系——视为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因素。当然，中国境内外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但是，本书的范围要小得多，因为本书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建制来加以研究。

^①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或者“CCP”是国外惯用的称呼，尽管正式名称是“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或者“CPC”。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反省期——探寻长期执政的经验教训

当其他共产主义政党纷纷下台时，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继续执政？中国共产党从这些共产主义政党—国家^①的失败和其他执政党体制（包括现存的共产主义国家、一党威权主义国家、多党制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中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自身的现状？如何把这种自我认识与对其他政治体制的研究相结合？198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这些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维持执政地位？这些正是本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

1989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随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主义执政党纷纷垮台。本书表明，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震荡期后，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执政党垮台的原因进行了非常系统的分析，并剖析了自身所面临的各種国内外挑战。这种对这些执政党垮台原因和诱因的探寻是漫长的过程（在中国引发了长达十几年的反省和争论），但也充满了现实感和紧迫感：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中国共产党应该从这些政权的垮台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呢？

因此，中国共产党所做的这些内部分析不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悠闲的学术研究。这项研究涉及了许多研究机构，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路线和长期执政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引起了各种争论，重点也发生了变化。不过，他们都一致认为，许多因素造成了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共

^① party-state, 有人译为“党国体制”。——译者注

产党的下台与苏联的解体。西方许多学者往往一味强调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行为和失误。与他们不同，中国学者的历史视野更为开阔，对苏联解体诸多因素的分析也更为系统。

中国的这些讨论反过来引发了一系列党内改革和涉及国家、社会和经济等领域的改革。尽管中国共产党对前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事件的反应是消极被动的，但是它在党内改革和国内改革上却非常积极主动。这些改革涉及面广，目标集中，都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这些政治改革的全面性和功效证明了西方学者和记者（包括那些居住在中国的记者）对中国的普遍印象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中国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改革，中国政治体制仍然是一个僵化的列宁主义国家，最终会踏上不可避免的民主征程。^① 西方分析家往往不太关注这些政治改革，因为它们是渐进和难以觉察的改革，并且发生在一党制的体制内，目的是要加强而不是取代这一体制。西方分析家们认为，如果改革不是民主化，那么改革就是无效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对于转变成西方甚至亚洲国家的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毫无兴趣，它的主要目标是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继续作为单一执政党进行执政。

这些政治改革证明了西方对中国的另一个印象也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支柱来维护它的执政地位。诚然，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两个主要来源，但是，它们不足以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何拥有长期执政的能力。单靠强制手段也不可能实现长期执政。即便是一党制国家也

^① 参见 James Mann, *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 New York: Viking, 2007。

需要通过满足国内不同阶层的需求来不断获得执政的合法性。

这些政治改革证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第三个流行看法是错误的。西方媒体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存在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随时可能爆发。^① 这种不稳定的环境既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果，也是它的威胁之一。本书认为，虽然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和矛盾确实存在，但它们尚未严重到威胁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地步。

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决不会坐以待毙。尽管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失去执政地位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它的领导人和干部也确信，只要进行自我反省、调整和实施具有先见之明的政策和改革，就可以避免灭亡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的双重状态

除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改革努力，本书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处于不断收缩的状态。有人会认为这种收缩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有人认为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有人认为始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还有人认为始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不管选择哪个起始点，许多指标都表明，作为一种建制，中国共产党对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力已经不断减弱。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控制手段——宣传、强制和组织——全都出现了相当大的收缩和弱化，尽管它们仍然是有效的控制手段。全球化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全方

^① 例如，参见“A Dragon Out of Puff,” *The Economist* (Special Survey of China), June 15, 2002; “China: What Could Go Wrong,” *Barron’s*, July 31, 2006。

位交往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今天，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各种紧迫的挑战：社会分化和不平等不断加剧，腐败盛行，失业普遍，犯罪率上升，农村地区动荡不安。

因此，本书的副标题——收缩与调适——抓住了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经历的双重过程。当然，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改革是否足以使其永葆执政地位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这些改革足以保证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执政（甚至加强它的执政地位）。因此，本书的结论是：改革的继续落实将会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然而，中国共产党发现它必须处在一个永恒的循环中：改革——调整——再改革——再调整……在这个循环中，每一次改革都会带来某些后果（有些是预料之中，有些则是意料之外），接下来又导致调整和进一步的改革。在这个不可逆转的动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消极被动，又积极主动，只能部分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调适性和灵活性。这大概是中国共产党在反思苏联解体时得出的唯一的结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是苏联共产党—国家的僵化，即教条的意识形态，顽固不化的精英，僵化的政党组织，停滞的经济，并且与国际社会隔绝。

毫无疑问，我们决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仅仅因为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执政党，它就会永远是执政党。这是极其幼稚的看法，不仅忽视了从1989年到1992年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失败的主要教训，而且忽视了许多威权主义—党制国家失败的主要教训。苏东共产主义国家的教训尤其有益。正如本书第二章所指出的，西方专家几乎都没有（除了布热津斯基）预见到或准确地预见到那些政权的失败。尽管西方可能抱着相当大的政治希望，期待这些政权会垮台（冷战时期的遏制和“和平演变”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此而设计的），却没能预见和预测到它们的实际结局。西

方的大多数苏联学家实际上都认为，尽管这些政权有时会面临一些挑战，但是它们的权力没有真正受到威胁，而且不管怎么说，它们还拥有许多强制的和其他的工具，从而使它们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这些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至少强制的工具难以胜任维持政权的任务。

因此，同样的逻辑并不适用于分析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一个政党长期执政并不意味着它会永远执政。但是，这并不是预言所有此类的政党最终都会崩溃和失去政权。不论是共产主义政府还是非共产主义政府，任何政府都不存在这种铁一般的规律。一党制国家确实能够长期地掌权，并且拥有各种保证长期掌权的工具和策略。“历史的终结”并不是不可避免的。^① 这些国家也不会像“转型学”和比较民主理论所说的那样全都会不可避免地“转型”，并演变成民主制。一些政党—国家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和策略，另一些则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和策略，采用后者比前者生存的几率更大，但是往往将两者结合才是明智之举。无所作为或仅仅加强国家的强制性是不够的。倘若明智的话，一党执政的执政党会不断努力调整自身及其政府，以适应新环境，但这是一种难以把握和维持的平衡。

在这里“调适”是关键的概念。所有政党包括共产主义政党就像植物一样，如果得不到足够的养分和阳光，就会枯萎死亡，但倘若受到“调适”的刺激，就会生机勃勃。事实上，正是这种枯萎死亡的危险，才能促使它们进行调适和发展。此外，僵化和调适并不必然会相互排斥，相反它们常常形影不离。

这正是中国目前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已经表现出列宁主义政党收缩和衰落的典型症状，但也正在证明自己在许多关键领域有能力

^① 参见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